

尤淇
著

胡 筵

拍

我的 记者生涯

胡筵一拍
跟随贺龙到冀中打日寇
孤军奋战海南20年的冯白驹

解放海南岛
访问琼崖黎苗山区杂记
宁死不屈的尤冠群先生

当代花木兰郭俊卿
轰天雷

孙根海和他的孩子

青青草原

纪念陶铸同志和岱钦塔拉大草原
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是我们的

田野无青壮

大丰晨曦

致毛主席的两封信

“火山”在芜湖爆发

“大包干”应是我国农业建设的主流方向

一个“包”字天地变

安徽首先爬出烂泥坑

致邓小平同志的信

三个包了产的农民

理发难

奖金该发

“八”害

新
华
出
版
社

胡笳一拍

——我的记者生涯

尤 淇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笳一拍：我的记者生涯/尤淇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12
ISBN 7-5011-7288-9

I. 胡… II. 尤… III. ①尤淇—回忆录②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K825.42②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3203 号

胡笳一拍

——我的记者生涯

尤 淇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发行中心联系电话：(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010) 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300千字

2005年11月第一版 200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7288-9 定价：28.00元



作者简介

尤洪，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名尤酣隐，江苏无锡西漳乡人。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120师战斗宣传队文化教员等。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四平第二区政府的秘书、区委书记，原辽北省委的《胜利报》记者，第四野战军新华社特派记者等。1952年后，历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浙江分社社长、安徽分社社长、江苏分社社长等。1985年离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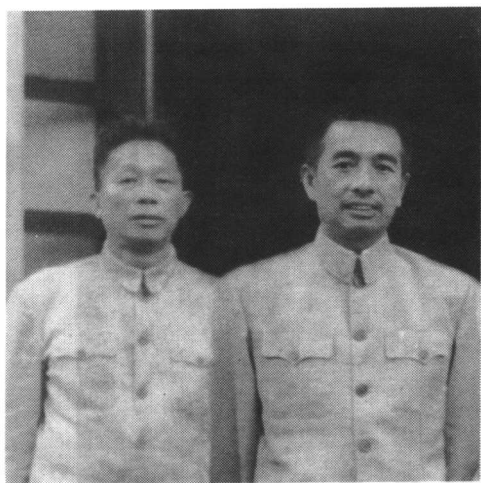


尤淇（时年 85 岁，尤叶勤摄）

你大笑什么？

当然有值得大笑的缘由。
前人发明了核、氢两弹，
破坏威力无穷。
邓公也有两弹，
一叫“改革”，二名“开放”。

改革把原核爆裂，
破除了迷信、“极左”和愚昧；
开放则如氢核聚变，
吸来了世上先进科技和资金。
如此梦幻般的成就，
怎不叫人笑得合不拢嘴！



陶铸与冯白驹（左）摄于
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与恩师舒群 30 年未见面。到
上世纪 80 年代相见，70 岁的他已重病在身，真
是叫人浩叹不已。

自序

在我的青年时期，当我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认识还在模糊不清的时候，曾受到过三次震撼灵魂的冲击，给了我终生受益的教育。

前两个冲击发生在抗战前。那是在“九一八”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把东北三省丢了，3000万同胞成了日本铁蹄下的奴隶，但他仍然不思悔改，还一直恬不知耻地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毫无抗敌御侮的准备。那时有一位名叫续范亭的革命元老，他泣血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团结全民力量，奋起抗日，收复失地。他的上书不被理睬，激使他怒发冲冠，径直跑到中山陵前切腹自杀。我看到这条新闻后非常激动，深感续范亭先生的人格无比崇高和伟大，他唤醒了我的爱国情怀。我那时才16岁，原本对爱国还只有一般概念的认识，看到续范亭先生的切腹自杀后，才懂得国家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整体，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因而人人应该有不惜个人生命、奋起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责任。

第二件事是在过后不久，我看到上海出版的《文学》杂志上，登载有东北作家舒群写的一篇小说，题名《没有祖国的孩子》。那时东北还没有完全沦亡，但大连早已被日本人占有。有一个朝鲜孩子，因为国破家亡，流落到我国的东北，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想到中国的内地去寻找求生的道路。他到了大连，旅客纷纷上船，独有他被大连海关的日本人认出是朝鲜人，认为朝鲜人是日本帝国的奴隶，不能让他跑掉，便一把把他抓出了登船者的行列。我读了以后，对这个没有祖国的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有好几晚竟然噩梦连连，梦到自己也没有了祖国，受到种种屈辱和奴役的痛苦。醒来

以后，自然更加深感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重要，对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更加仇恨。

以上两件事唤醒了我的爱国觉悟。

第三个冲击发生在贺龙率部转战的敌后战场。“七七”抗战后不久，我逃出即将沦陷的家乡，流亡到武汉，认识了正在编辑出版《战地》半月刊的舒群。他介绍我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第八队，后又介绍我去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到了1938年冬天，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定，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准备率领一部分主力向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冀中前进。鲁艺此时成立了两个随军实习小组，一个由作家沙汀和诗人何其芳任组长，带领鲁艺的几十个学生跟随贺龙去前方，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小组由卞之琳、陈荒煤率领，跟随邓小平去晋东南。

到了晋西北，我被分配到师政治部的战斗宣传队担任文化教员，专教那些少年娃娃语文和算术。大军越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后，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干刻蜡板的工作。不几天，大军便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到了冀中。那时，贺龙的过路部队有7000多人，骡马叮叮当当，天又黑，道路早被当地人民和游击队破坏得支离破碎，遍地深坑，行进缓慢，由此被敌伪发现。从此我们的头上天天有敌机跟踪侦察，战斗也就天天不断。据师部统计，在贺龙率部进入冀中后的头半年里，大小战斗就有200多次，其中齐家会和黑马张两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日寇久攻不胜，兽性大发，曾动用了违反国际公约的毒气弹。

半年的实习期满后，沙汀、何其芳便准备率领我们回延安，去继续后期的学习。正在这时，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部队需要人，希望你留下来工作。”

甘泗淇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宛如晴天霹雳，打得我晕头转向，不知所在。原因是我家赤贫，父亲早死，母亲先去纱厂做女工，后来当女佣，一月只赚三块钱，没法供我读书，所以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到延安后难得得到一个读书的机会，我哪能轻易放弃，因而我回答他说：“我要跟随老师和原班同学回延安去，读完后半段的课程，这是学校再三宣布了的。”

甘泗淇严正地说：“固然学校是这样说的，但是抗战期间，一切都得服从前方的需要。”

我急得哭了起来，我说：“我不是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愿意到部队工作，但是现在不行，我一定要读到毕业。”

甘泗淇更加强硬地说：“是前方抗日重要，还是你读书重要？”

我说：“当然是前方抗日重要，但是我个人的读书学习也重要，文化基础不好，干什么都不行。”

甘泗淇没让我把话说完，抢截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一定靠读书才能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提高得更快。你已具备了基本的文化基础，完全可以不必再去专门读书，应当多在战争中锻炼提高。”

那时我的思想水平很低，组织观念更差，居然跟甘泗淇辩论了起来，我说：“书本知识是基础，我就缺少书本知识。我一定要回去。”

甘泗淇见我跟他胡搅蛮缠，突然火冒三丈，从坐凳上跳了起来，举起他粗壮有力的拳头，向他面前的那张方桌狠狠地击了一拳，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声巨响过后，他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现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人人应该奋起救国，你岂可逃离战场，不顾民族安危？难道打日本是别人的事，你没有责任？”

我真没有想到，甘泗淇会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气，还讲出这么天经地义般不容人置辩的真理，这对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我不愿意放弃多读书的愿望，又不敢反驳他，只好沉默不语。

过了一阵，甘泗淇见我不吭声，以为我已被他说服了，便问道：“怎么样，你同意留下来了么？”

我更加无法吭声，我不会说“留”，也不好开口说“不留”，怕他发出更大的火气。

甘泗淇语气稍稍缓和地又说了一遍：“怎么样，你同意留下了么？”

到这时，我没法再不吭声，只好咬了咬牙回答他说：“我领会你讲的道理，但是我现在的心情，还是盼望着读书，我想跟我们的老师

和同学一起回延安去。”

我说完了这话，害怕得不敢望一望甘泗淇的脸。

我等待他的怒吼，谁知怒吼久久不来。我偷偷地朝他站立的地方望去，不见了他的人影，原来他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屋子较大，是冀中有钱人家的一个中厅。他转过来，又转过去，一直转了几圈，然后把大手一挥，带着失望的语气说：“既然你一再表示不肯留下，那也没有办法，明天你就和你们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回去吧。”

我一听这话又喜又愧，喜的是他放了我，愧的是我成了抗日战场上的逃兵，逃避了我应负的一份抗日救国的责任。

以上三次震撼，就像给了我一面镜子，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时时对照我的作为，是否对得起我的国家和人民？

这本集子，就是我在镜前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一直当记者，心里老想着过去受到的教育，因而时时鼓励自己要为国家 and 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适巧新华社的领导，每次开会都要强调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这是很合我的心意的。从1954年起，我就前后担任过新华社粤、浙、皖、苏分社的社长，每年总要挤出三四个月的时间下乡采访，真心跟农民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向分社记者提出的口号就叫“劳动采访”，当然我自己要首先执行。深入的结果，对农村情况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也就敢于向上反映，其中有些是极尖锐的意见，由此而受到过严厉的处分，包括连降4级和开除党籍。我虽做不到“无怨无悔”的程度，但一旦平反，仍然不断往农村里跑，不断反映农村的重大问题。我之所以有此胆量，是与我过去受过续范亭和甘泗淇的教育有关。只可惜我的文化基础太差，不能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只能有胡笳一拍，而不能多有几拍。

以此作为本书的自序。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卷 战火纷飞

胡笳一拍	(3)
跟随贺龙到冀中打日寇	(63)
孤军奋战海南 20 年的冯白驹	(83)
解放海南岛	(97)
访问琼崖黎苗山区杂记	(104)
宁死不屈的尤冠群先生	(112)
当代花木兰郭俊卿	(116)
轰天雷	(142)
孙根海和他的孩子	(148)
青青草原	(157)
忆念陶铸同志和岱钦塔拉大草原	(173)
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是我们的	(181)

第二卷 大地呼唤

田野无青壮	(199)
大丰晨曦	(205)
致毛主席的两封信	(218)

“火山”在芜湖爆发	(221)
“大包干”应是我国农业建设的主流方向	(234)
一个“包”字天地变	(237)
安徽首先爬出烂泥坑	(241)
致邓小平同志的信	(248)
三个包了产的农民	(250)

第三卷 杂文随笔

理发难	(267)
奖金该发	(270)
外客论“公”害	(272)
远房表弟	(274)
汉中多美女	(277)
对抽紧银根的呐喊	(280)
姜太公钓鱼	(282)
访问西德七记	(284)
记者生活杂记	(297)
记者和编辑要学法	(305)

第一卷

战 火 纷 飞

胡 笛 一 拍

——我的记者生涯

蔡文姬在匈奴，写作《胡笳十八拍》，悲壮哀怨，凄切动人，感动了曹丞相，派人把她接回了中原。

现在，匈奴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那胡笳实际上已成了华笛，吹奏胡笳已非异国之音；不过总有一点大漠之风，肃杀之气，与中原音色不太一样。

我在中国新闻界这个大交响乐团里演奏了40年，吹的就是胡笛。有些人不爱听，以为太粗犷刺耳。我本人则以能吹胡笛自喜，虽不能吹十八拍之多，但愿有一拍能使整个交响乐由混浊变为清新，由低沉转为激越，使人心神振奋，我就不胜欣慰了。是以为题。

一、我的青少年时期

我是江苏无锡西漳乡人，原名尤酣隐，1938年从武汉跑去延安参加革命时，就用这个名字。这个古怪的名字是我父亲取的。我的父亲叫尤漱泉，是小学教师，兼任民办修谱局的撰稿员。修谱员是代人写家谱的，要有较好的文笔。他因为文笔好，在乡里出名，就自鸣得意，吸上了时髦的鸦片，这位瘾君子就把我叫做了“酣隐”，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

因为父亲吸食鸦片，把几亩农田卖了，把住房也卖了，弄得山穷水尽，只好戒烟；因中毒太深，戒了30多天就死了。

因为父亲吸食鸦片，家境一直不好，我母亲便进纱厂做工，贴补

家用。我小时，没地方寄托，母亲便把我带进工厂里去，把我放置在轰隆隆的织布机旁边，一坐一整天。这家工厂叫庆丰纱厂。我陪母亲进出工厂几年，天天看到工头打骂工人，抄女工的“靶子”（搜身），时常还见到有的工人被砸得头破血流的工伤事故。

我在家乡读完初小，母亲想叫我去学木匠，她说：“有个手艺，不致成为‘废人’。”我的叔父叫尤冠群，是尤家坦小学校长，受过我父亲的指教，他劝我母亲说：“大嫂，这孩子聪明，学木匠可惜了，还是叫他多读几年书的好。”我母亲说：“小叔，他父亲一死，欠了许多债，没钱供他啊。”叔父说：“就是借钱，也要念书才行。”言下之意，叔父是愿意帮一点忙的，后来果真也帮了。我母亲为了多赚几个钱，便辞了工，找到无锡城里的薛润培先生家去当保姆，专门奶养他的孙女薛琪（解放后曾当过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薛家是无锡有名的丝业资本家，家里应酬多，给保姆的赏钱多。我的母亲会带孩子，颇得主人赏识，我母亲便向他借钱，供我考进无锡第二小学读书。第二小学在原来明末有名的东林书院内，在无锡算是一家好学校。我寄宿在二小读了两年高小，年年是班上的第一名。

二小的墙角有块石碑，上书“此之谓大丈夫”六个大字。我不懂，便问老师。老师就讲明朝学者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反对当朝宦官魏忠贤的故事，对我幼年的思想很有启发。

我在高小毕业时，母亲已换了主家，到无锡另一个有名的工业资本家唐保谦家当保姆，专带他的大孙子的儿子。唐保谦就是无锡庆丰纱厂的大老板，他的大孙子叫唐瑞千。唐瑞千待人十分和气，他与我母亲商定，只要孩子带得好，可以让我住在他家里，白吃他的饭。我有了落脚处，便去考中学。那是1932年夏天。我先去报考无锡洛社乡村师范，那里培养乡村教师，供食宿，不要学费。我样样考得好，只有一题过不了关。那一题是：“中华民国是以党治国，还是以民治国？”我想，既称中华民国，就应该以民治国，不能以党治国。我的解答显然错了，便没有被录取。这样一来，便把学费便宜的公立中学的考期错过了，我只好去投考私立江南中学，硬着头皮借了20多块大洋读了半年。

江南中学的校园里有一口池塘，旁边竖有一块石碑，上写“高子止水处”，就是高攀龙被阉党追捕时跳水自杀的地方。在小小的无锡城里，与东林党有关的史迹就这两处，都被我读到了，这对我一生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因为学费太贵，我读不起，第二学期便转入无锡县立初级中学。

读初中的两年半，我都住在唐瑞千先生家里，还白吃他家的饭。问题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睡觉，有时睡在柴草堆上，有时睡在黄包车间里，有时睡到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到处没有灯火，没有我复习功课的地方。我的学习便一落千丈，到后来留了级。这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叔父还骂了我，我没敢还嘴，因为我不好意思说我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我一气之下，发誓再不读中学了，便考进了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的练习班。这是中国最大的蚕丝业资本家薛寿萱先生培养蚕丝人才的地方。薛寿萱就是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薛福成的孙子，他因有雄厚家产，有独霸全国蚕丝业的雄心，他年年要招考培养一批蚕丝方面的中级技术人才。每届练习班分两期，前期半年，以上课为主，不合格的淘汰；后期两年，以实习为主。训练是十分严格的。我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半，刚好毕业，抗战爆发，不久上海失守。我因不愿留在无锡当亡国奴，便向内地流亡，到了武汉。

我是和练习班的同学陶杰一起流亡的。陶杰是浙江绍兴人，性格像秋瑾、鲁迅那样刚烈，曾参加上海工人援马团到东北打过日本。他在上海报上看到了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赶到无锡报考，成了我的同学。

我们到武汉后没有工作，心里很慌。我想去考兽医学校，学个专长，既能抗日，又有饭吃。陶杰不同意，他说：“天下这么大，哪会没有我们走的路。”那时，革命作家丁玲和东北作家舒群在武汉主编《战地》半月刊。丁玲的声名早就很大，舒群也不小，他在抗战前写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是“国防文学”的典范，曾轰动一时。我就用陶杰曾是东北援马团一员的名义，给舒群写信，要求他介绍个救亡工作。舒群约见了我们。在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把我们介绍给了戏剧家葛一虹和许之乔，许之乔再把我们介绍给上海救亡演剧第